

一、

童年的我，像是玻璃櫥窗裡一件精緻的擺設，擦得晶亮，安穩地立在最顯眼的位置。那時的日子，永遠是被安排得妥妥帖帖的。在直笛團與田徑隊之間穿梭，段考總在前三名停留；語文競賽是全市的首席，科展與模範生的名單也未曾缺席。榮譽層層相疊，如瓷碗高壘，縝密而平穩，縫隙間不許半點塵埃棲身。

走廊上，師長與我擦肩，總會輕輕拍一下我的肩膀，目光裡帶著預支的驕傲；同學遞來紙條，折成小小的方塊，展開時在角落上寫著「妳是我的偶像」。那時我不懂孤單，朋友不必去尋找，似潮水般自己湧來。舞台上的燈光白得凌厲，卻讓人安定，那是明晃晃的確認——站在高處，它就會準時落下。頒獎時，獎盃在掌中沉甸甸地墜著，將一種默契壓進掌紋：只要保持優秀，眾人的善意便不會缺席。

那樣的日子曾被我視作恆常，彷彿潮水永遠溫順。誰知某日，它忽然退得決絕，不留半點餘痕。

二、

裂痕來得很隱秘。

國一的某個傍晚，父親的車停在樓下，卻沒有熄火。廣播聲從車內滲出，音量漸漸升高，蓋過我桌上的翻頁聲。下樓後，看見他癱在駕駛座，額角沁著冷汗，眼神空洞，仍強撐著將車停回家。醫院的白光冷得像未經太陽照過的瓷面，醫生說是腦血管破裂，聲音平穩得像在報天氣。數日後，病床空了，走廊外的天卻異常晴朗。

我並沒有因此放下手中的書。反而讀得更久、更狠，像要用知識的磚石，把現實的空洞一塊塊砌起。每天回家休息半小時後，我便坐在書桌前，一直讀到凌晨兩、三點才在客廳沙發上昏睡過去。半夜醒來，沖一把涼水，繼續翻書。

可精神逐漸像被蛀空的木頭，輪廓尚存，內裡卻一碰即碎。課堂上，我壓低頭，蟄伏的淚水在眼眶打轉；回到家，便像換了個人，對著牆壁大吼，把拳頭捶得生疼。這樣的日子不知何時開始，也不知何時結束。

三、

缺席一開始是偶爾，後來成了習慣。病名被確定，藥物按時服下，卻沒能讓我回到教室的長桌旁。老師建議自學，我在家裡度過一日又一日，書翻了幾頁，心思便荒了。白光從窗縫照進來，落在牆角，又慢慢退去。這三年，與國中同學相處的時間不過八個月，其餘都是和自己拉扯。

高中（應屆）是另一張白紙。我帶著幾分謹慎落下第一筆，卻察覺右手已不再如昔般聽令。基礎知識的空洞，使理科課本在眼中成了一本本無字天書。偶爾到校，總無疾而終；回到家，仍在解題與擱筆間擺盪。

有人說這是虛度，我卻覺得，虛度也是耗費心力的事。任憑時間流逝，是需要力量的——那是拒絕被推著走的固執，是在原地與世界角力的方式。

四、

十八歲那年，病情稍稍穩定，基礎則由家教補足，我到新北找了所無需會考成績的高中。那年，我重新交到朋友，看似回到「正常人」的軌道。

高一的班導與我以往遇過的老師不同。

過往的經驗教會我無須驗證的結論——當你一次次缺席、在關鍵時刻一次次缺位，人們便會收起熱情，如同端在手中的茶水漸涼，終於不再溫熱。他們不會責備你，卻會用一種近乎乾涸的沉默，將你推離他們的日常。

而她沒有。

即使我頻繁地不去學校，她依然在我回校的時候走近，像在照料一株生長不穩的花，不急著催它開，只是時不時掂掂土的濕度，調調方向，讓它多得一點陽光。她會隨意地和我聊天，問的不是成績，也不是病情，而是一些瑣碎得像路邊小攤的東西：前一天有沒有睡好、早餐吃了什麼、最近讀的那本書好不好看。

那種關注，不是舞台上的聚光燈，而是夜裡廚房裡留著的一盞小燈——不耀眼，卻恆常。

在那段時間裡，我的心像長久浸在冷水裡的手，對熱度的感知幾乎消失。而她的不厭其煩，讓我明白，仍有人願意在我失色時，靜靜守在原處。

我曾深信，一切關係終將走向失望與離去，不過是時間的先後——如同每艘船都必定回到港灣，有的近在咫尺，有的隔著整片海天。然而，她讓我動搖了這個信念。那不是什麼劇烈的改變，而是一種極細微的、幾乎聽不見的鬆動，像是牆角的水泥，在一夜春雨後悄悄生出一條細縫。

還有我的英文老師。

第一個學期，我被選為英文小老師。那是份帶著光澤的差事，能走進講台旁的小空間，替老師整理講義、對答案，像是被邀請到一個只有少數人能踏入的領域。可期中、期末的段考，我一次次缺席，進度拖得像一條過於鬆散的線，連自己都覺得愧疚不安。

我以為這份職務會就此終止，畢竟，在這個世界裡，人們習慣用「可靠」來衡量價值，而我顯然已不再可靠。然下個學期，她依舊把我的名字留在名單上，像是從塵封的櫃裡拿出一塊未被丟棄的舊絹，輕輕拭去灰塵，再鋪平。那是種極寧靜的信任——無需宣布，也無需討論，就那麼自然地給了我。

有一次，她隨手遞給我一塊蜜地瓜，說：「試試看。」

那是冬日的甜，黏潤又厚實，像久煮不化的心意。我說好吃，她便笑了一下，沒多說什麼。之後，她開始悄悄地把蜜地瓜留給我，有一次甚至特地到老街，買了一整包，用不顯眼的紙袋裝著，低聲叮囑：「別跟別人說。」

那份甜，和蜜地瓜的濃潤一樣，緊緊黏在記憶裡。它不是盛大到要張揚的恩惠，而是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：她知道我並不總是「好」，卻仍願意在我可見與憔悴的時候，留一點溫暖給我。

然而，考試依舊是無法跨越的坎，缺席的陰影仍如影隨形。諮商兩年，像在深井裡打水，偶爾有一瓢清涼，多數時候卻只有空桶裡迴蕩的聲響。

五、

高二那年，我像誤入一場錯配的宴席。自然組的課本攤在桌上，滿紙的符號與公式像不相識的親戚，寒暄未及，便先行告辭。三天的課程，換來一整年的退卻。牆不再是磚石砌的，而是由抽象的數字與符號編成，冷白、無縫，不留半點喘息的餘地。

那位班導與我以往遇過的老師不同。他不如高一班導那般寬容，亦不似英文老師會在課間送來一包蜜地瓜。他的嚴肅，不是刻薄，卻帶著某種與生俱來的距離感，彷彿冬日清晨的霜，並非針刺般的寒，而是種拒絕融化的冷。這冷，本不是惡意，只是我那時需要的，恰好不是它。

我逐漸明白，人的困境並不會因外力的到來而自行消弭。有人能引領方向，有人只能維持秩序，而秩序並不能替代救贖。那時我才承認，期望他人完全讀懂自己的渴求，本就是一種過於奢侈的想法。困境有它的慣性，會在不同的季節、不同的面貌下重現。既然如此，唯有另闢蹊徑，繞過那無法被推倒的高牆，才能在

夾縫間為自己尋得一線微光。

我開始嘗試參賽，並以特殊選材為途徑，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尋覓一線可供突圍的罅隙。既然不能用考試去證明自己，便以勝場累積另一種憑證。這些比賽各有其規則與癖性，像一串形狀各異的鎖，而我手中並無全然契合的鑰匙，只能以時間與精力試探。一次次的角逐，如同將手伸入幽深的水域摸索，每碰到一枚獎牌，都是一次短暫的呼吸。

有人將這稱作另闢蹊徑，而在我看來，這更像是在尋覓一方可資存活的微氣候。那是塊不受課本與考卷宰制的土地，在那裡，缺席不再是罪名，失落亦無須即刻矯正。我所做的，不是逃逸，而是改變戰場的形狀。

此刻，我正在為比賽奔波，心境卻異常沉著。這四個月間，我參加了近二十場比賽，像一列車在夜色中急駛，沒有停站的間隙，只有窗外模糊而急掠的燈影。疲憊是真實的，沉甸甸地壓在肩頭，可它的重量反而讓我有了依憑，不再飄搖。因為身旁有寵物在熟睡時微顫的鼻尖，有母親低聲交談時溫潤的聲線，有家人靜默卻穩固的守候，亦有友人在訊息裡偶爾閃現的一句「加油」。

這條路，與從前的不同。過去的日子像是在無人煙的戈壁上繞圈子，風沙打在臉上，走到哪裡都是同樣的荒涼。如今，我知道前方的日子是有限的，只剩幾個月——幾個月後，我將不必再與那無止境的輪迴相對。

六、

高二的班導，雖然在我眼裡始終隔著一層霜，但如今回望，那霜底其實也有暗流在運作。許多我無法親自到校處理的事，他默默替我奔走、簽章、溝通、協調，像替缺席的我在學校留下一個影子，免得一切徹底斷裂。他並不把這些事拿來說嘴，也不因此改變對我的態度。那份冷漠仍在，可它已不再只是距離，還多了分可靠的重量。

我開始更能分辨不同的善意。有些善意像聚光燈，明亮卻炙熱，照得人無所遁形；有些善意像春日細雨，不催促、不佔據，只在無意間滲入土壤。高一的班導、英文老師、高二那位隔層霜的導師，都是不同形態的天氣。他們各自的溫度，讓我學會了在多變的氣候裡調整步伐，而不再只是被動地承受。

回望那段曲折的路，我才懂得，原來並不是每段缺席都意味著遠離，有時，缺席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在場。那些未曾參加的課程、缺漏的考卷，被我用比賽的稿紙、朋友的笑聲、母親煮的湯一點一點地補上。雖然縫線歪斜、顏色不一，卻真實縫合了我的生活。

十八歲以前，我以為自己只能活在被安排好的軌道上；十八歲之後，我才明白，離開既定軌道，不一定是墜落，也可能是另一條路的開始。如今，高二將盡，我不再急著向誰證明什麼。我知道，我不被「優秀」定義，而是那個在廚房小燈下，靜靜熬湯的人。